

“劝捐”背后的真相：世界粮食真不安全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以下简称“世界粮食计划署”)“劝捐”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代隐喻。

联合国多家机构撰写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当前全球饥饿人口多达8.11亿，约占全球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一直以来，经济不发达甚至衰退、冲突和气候变化是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与前述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催化、相互影响，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如何全面客观研判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劝捐”埃隆·马斯克的实质是什么?如何推动各国粮食体系转型?就相关问题，我们专访了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屈四喜。

一

联合国用四个维度来描述粮食安全。供应——是否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包括生产、粮食储备、市场运输等方面。

获取——如果说食物供应没有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家庭和个人能否获得充足的食物。

利用——如果有充足的食物供给，同时家庭也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下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食物资源。

稳定——稳定性是维持整个系统的重要因素，这确保家庭在任何时候都处于粮食安全的状态。

根据粮食安全的定义，粮食不安全也分为几类。

中度粮食不安全：指的是人们在获得粮食的能力方面面临不确定因素，在一年中，由于缺乏资金或其他资源，人们有时被迫减少他们所消费的食物质量或数量。即无法稳定地获取食物，这会降低饮食质量，扰乱正常的饮食模式，并可能对营养、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重度粮食不安全：指人们可能已经没有食物，经受饥饿，以及最极端的情况下，连续几天不吃东西，这使他们的健康和福祉受到严重威胁。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自2015年开始逐渐恶化，饥饿人口以每年超过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状况堪忧，远远偏离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从饥饿人数看：当前全球饥饿人口多达8.11亿，约占全球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有关资料还表明，全球43个国家的4500万人处于饥荒边缘，比2019年的2700万多出不少。

从饥饿区域看：饥饿人口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亚洲、三分之一以上位于非洲，且非洲是饥饿人数增幅最大的区域，饥饿人数占总人口的21%，是其他区域的两倍多。

从粮食浪费看：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约有1/3被浪费，相当于13亿吨粮食，具体而言，约合近1万亿美元的经济成本、7000亿美元的环境成本，以及9000亿美元的社会成本之和。

从粮食价格看：全球供应链压力很大，全球粮食价格创下近十年来新高，海运等行业领域有中断风险，贸易摩擦有卷土重来之势，提供粮食援助的成本也在不断提高。

从援助人数看：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21年援助人口数量达到1.4亿，比之前几年增加不少，2019年是9700万，2020年是1.38亿。

还须警惕的是，当前全球疫情远未结束，更危险的新冠变异病毒极有可能蔓延，多国实施不同封闭隔离措施而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最大的领域在于粮食安全。

这种影响还在持续中。

瞭望智库：您有在中国地方工作的经验，又有在中国农业农村部相关工作的履历，在世界粮食计划署也服务多年，能否结合个人工作生活经历，谈谈当前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因素有哪些?

屈四喜：其一，经济不发达甚至衰退极大地影响着粮食安全，是造成粮食不安全最根本的原因。

全球而言，粮食是足够的，但具体到某个国家、某个区域、某个人，就可能会出现想买而没钱、有钱买不到的情况。

这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安全保障率低，同时缺乏购买力，买不起足够的粮食，加上市场波动、贸易战等因素，粮食安全不安全隐患就愈发严重。

《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

示，当前全球21.5%的饥饿情况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

其二，冲突也在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冲突包括国家内部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冲突使陷入突发性粮食危机的人数从2019年的7700万，增加到目前的近1亿人。2020年，因冲突导致的饥饿发生率约为18.5%，2019年是17%。

在阿富汗，塔利班2021年8月占领全境后，外国援助就此中断，国内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价格飙升，普通民众无力承受，目前共有2280万人面临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状况，98%的人吃不饱饭。气候是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影响着粮食系统从生产到消费的所有环节。2020年，超过5000万人受到洪水、干旱和风暴等极端气候灾害的打击。气候灾害破坏了土地和种植业，并且危害到畜牧业和渔业。

其三，气候危机加上严重的冲突，会使部分国家现有的粮食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加剧，损失、破坏和绝望情绪也在加剧。受冲突影响地区的极端气候事件会大大破坏当地家庭，甚至阻碍了来自国际的人道主义援助触达社区。

不能忽视的第四个不利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

具体而言，疫情干扰生产，使家庭层面收入减少，国家层面财政收入下降，国际方面援助方忙于国内疫情，援助渠道受阻。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出全球粮食系统的脆弱性，直接导致7000万-1.6亿人陷入饥饿困境，极大地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饥饿状况。

二

瞭望智库：不久前“劝捐”埃隆·马斯克的新闻引起热议。在您看来，此类事件对解决全球粮食问题是否有作用?

屈四喜：由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金来源依靠各国政府的自愿捐款和私营企业与个人的捐赠，因此，这个事从头到尾我们也一直在关注。

我们发现，通过这一热议事件，公众更加关注到贫富差距问题和日益加剧的全球粮食不安全形势，意识到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阻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实际上，2021年9月份，联合国召开了粮食系统峰会，旨在号召各国团结行动，凝聚共识，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提升其粮食保障能力，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在此背景下，“劝捐”也是在鼓励更多高净值人群，为改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世界粮食计划署以扶危济困，追求全球粮食安全改善和营养改善，追求人人有饭吃为宗旨，与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一道，正在努力帮助数千万面临饥饿的人，然而目前资金来源十分有限，需求远远超过了现有资源。

仅以阿富汗为例，目前正面临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前面也提到了，98%的阿富汗人没有足够的食物。

“劝捐”，也让公众更了解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全球开展的工作，从而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其中。

捐助方、合作伙伴和支持者之间的信任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成功的关键，其年度执行情况报告、年度报表、内部审计报告以及评估报告等都按照严格的标准执行并可供公众查阅。

瞭望智库：“劝捐”一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推动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粮食体系转型的紧迫性，实际上推动各国粮食体系转型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渐成共识。在您看来，推动粮食体系转型的途径有哪些?

屈四喜：推动粮食体系转型对于持续全面地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人人有饭吃”至关重要。

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认为，可以通过六大转型途径推动粮食体系转型：

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将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建设的政策相结合，形成合力，不要脱节。世界粮食计划署本身就是横跨“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建设”三大领域的机构，202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即是最大的肯定。

提高粮食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加强最弱势群体应对经济不发达甚至衰退的能力。

在食物供应链中采取干预措施，降低营养食物成本。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世界约有30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远远超出饥饿人口数量。

解决贫困和结构性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国别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域差距等。

改变消费者行为，引导消费者更合理更健康消费。

除此之外，营造有利的治理机制和制度环境，赋能妇女和青年等措施，也是推动粮食系统转型的重要途径。

为妇女赋能往往会给妇幼健康带来积极影响，有助于改善营养。联合国的很多项目中，都非常强调这一点。

粮食体系转型的效果还取决于它是否与环境、教育、卫生、社会保护等其他体系之间实现连贯一致和相互联动。

如教育体系，包括对学龄儿童提供学校营养餐、教授必要的食物生产知识和技能，开展营养教育，并提高消费者有关最大限度减少食物消费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认知，在粮食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2021年9月份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更可持续和更公平的粮食体系的五条行动轨道：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而有营养的食品；转向可持续消费模式；促进对自然有积极影响的生产；促进公平生计；培养抵抗脆弱性、冲击和压力的韧性。

要实现建设更可持续和更公平的粮食体系，有赖于国际社会各成员积极将这些想法与各自的发展战略和具体项目紧密结合，不然就是一句空话。

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持续努力地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重视自身的粮食体系建设，提升自己的保障水平。

同时，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与交流，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的国际贸易往往受到政治因素比如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的干扰，增加了成本，阻碍了贸易的正常流动。

三

瞭望智库：饥饿和贫困是一对双胞胎。您曾高度评价中国在扶贫领域的成就。有哪些经验可为解决当前全球饥饿问题提供镜鉴?

屈四喜：毫无疑问，在反饥饿和反贫困的事业中，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十分丰富，为世界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借鉴。

由于工作原因，我参观调研了不少地方，更是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反贫困上——过去40余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在2020年底消灭了绝对贫困，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十年实现了目标。

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很多，比如：在扶贫工作中抓住经济发展这条主线，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创新、坚持全社会广泛参与。其中，“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和“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方法和措施在脱贫攻坚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非常明显。

中国脱贫人口在衣食住行，以及医疗教育等方面获得了良好保障，许多脱贫人口的生活实现了世纪跨越。

2020年10月，我参加了驻华外交官湘西扶贫成效实地考察，特别感怀于精准扶贫给花垣县十八洞村带来的天翻地覆变化。遥想当年，这还是一个偏僻落后、资源稀缺的小山村，它通过自己的努力、国家的帮扶，通过再造资源，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如果不是精准扶贫，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如这么大的变化的。这个地方也成了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诞生地，新长征路上的转折点。

2021年9月底，我参观考察了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的黄花滩生态移民工程。几年前我过去过一次，这次主要是感受下变化。在综合措施的帮扶下，通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技能培训、集体经济等，从不宜居的深山区搬迁出来的6.2万人的生产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真正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要求，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2021年7月，我与朋友们一起在内蒙古

和宁夏见证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的菌草技术在黄河流域的大规模成功推广，亲眼看到了菌草技术在脱贫攻坚、治沙防沙、种草养畜、种菇创收、生物能源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菌草技术在中国乡村振兴和帮助他们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安全水平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反饥饿上——中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缺粮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对中国提供粮食援助，支持了很多以工代赈等大型援助项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饥饿问题。1979年，受中国政府邀请，世界粮食计划署来华开展援助工作。

40多年来，中国持续不断对粮食安全道路的探索，是非常成功的：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有机衔接。政策不好，就调动不了农民和政府的积极性；没有科技，进步会非常慢；科技、政策都具备，没有投入是不能将蓝图转化为现实的。

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重视“三农”工作和粮食安全，始终发展和依靠科学技术。

中国用占全球6%的水资源、9%的耕地资源，很好地解决了占世界20%人口的吃饭问题，人均粮食占有量470多公斤，高于世界平均的400公斤，这无疑是对全世界粮食安全的极大贡献。

除了生产，中国还有完备的粮食储备体系，以及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可以从粮食生产、收获、储藏、加工、包装、运输等各个环节入手促进粮食减损增效。

2021年上半年我去江苏、浙江考察了粮食储备情况，切身感受到科技化的“保鲜储粮”所带来的巨大作用，这对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粮食储备体系、减少产后损失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过去我们是“保质储粮”，现在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区正与国家粮储局合作，推动“保鲜储粮”，把这些经验、模式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信它们能从中受益。

四

2016年起，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中国加强合作，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优势，充分发挥多边机构的平台作用，与合作伙伴一起，在中国开展了一些小型的创新性合作项目。

目前正在实施的创新项目有7个，涉及乡村学龄前儿童营养、小农增产增收和抗风险。

我们在湖南、广西、甘肃、四川的5个县市、37个乡镇开展了学龄前儿童营养改善试点项目，直接惠及近8000名农村学龄前儿童。项目内容包括改善就餐条件、提供营养膳食、开展营养知识宣教、结合小农户精准扶贫和产业发展等。

在安徽金寨和甘肃定西及东乡，我们实施了小农户增产增收项目，帮助贫困农民尤其是农村留守妇女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发展猕猴桃生产，使贫困户能够参与分享当地猕猴桃产业价值链的增值收益，直接受益农户3300户。

在吉林松原，我们启动了一个农业风险综合管理试点项目，主要是通过开展“水肥一体化”“保险+期货/期权”和农民培训等方式，探索建立综合风险管理模式，加强目标农户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通过采用农业风险综合管理手段及可持续农业技术，可以使2万农民直接或间接受益。这些创新试点项目都进展顺利，深受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欢迎。

我们也在甘肃实施了富锌马铃薯小农试点项目。通过对富锌马铃薯的推广和生产，我们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民生计以及微量元素锌缺乏问题，以实现中国政府的精准扶贫和营养改善目标。

这7个创新性项目与中国相关国家部委紧密合作，着眼于农民特别是小农的增产增收与市场的连接，其中乡村学龄前儿童营养项目与小农帮扶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为儿童提供合理膳食补充，改善营养不良状况，另一方面可为贫困小农提供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增加农户收入。

目前我们还搭建了平台，国家部委(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企业、科研院所、民间机构等志同道合者可以在上面相互合作。